

夢想追尋：一種關於亞洲巨型都市規模的文化解釋

胡海豐¹

摘要

隨著人類文明的進展，全球都市化的程度亦日益加深。關於都市形成與規模的理論，一般認為有兩種典範：一種是大規模開發商在國家土地市場的競爭模型；另一種則是經濟上聚集效果的自我組織模型。研究上多從聚集經濟、規模經濟等效果來解釋都市的人口成長；另一方面，隨著都市擴張而不斷增加各種成本，則是抑制都市成長的阻力。這些助力與阻力的消長，決定了都市的人口規模動態。2011年，全球共有26個人口超過1000萬的巨型都市，其中就有15個位於亞洲，並包含了前六大；另外，相對於西方巨型都市的穩定規模，這些亞洲巨型都市的人口，仍然隨著經濟發展而不斷地快速增加。這些現象說明了原先用以解釋都市規模的經濟理論，在亞洲巨型都市的應用上，可能有補充的空間。本文認為：亞洲文化中，居民遷徙到大都市「追尋夢想」，「渴望成功」的趨力，可以補充解釋亞洲巨型都市的人口成長動態，也能部分說明東西方都市人口密度的差異。

關鍵詞：都市化、都市規模、巨型都市、夢想追尋

¹ 文藻外語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系 副教授，電話：(07) 3426031 分機 6621，E-mail: harris@mail.wtuc.edu.tw。作者非常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與寶貴意見。
投稿日期：2012年8月6日；第一次修正：2012年10月17日；第二次修正：2012年12月12日；接受日期：2012年12月18日。

Dream Pursuing: A Cultural Explanation for the Size of Asian Megacities

Hai-Feng H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extent of urbanization rises. There are two paradigms of city formation and size. One is the competitive model of large-scale land developers operating in national land markets, and the other is the self-organization model of agglomeration. Usually, researchers use the 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 and scale to explain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creasing costs along with urban expansion constrain the growth of city. Thus the dynamic city size is determined by the net effect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s. In 2011, there are 26 megacities which their populations are over ten millions all over the world. Especially, 15 of them, including the top six, are in Asia, and the sizes of most Asian megacities are continuously growing over time. The phenomenon impli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current theory regarding city size may have some gap in Asian megacitie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fill the gap by bringing the “dreaming pursuing” factor of immigrants into the analysis of giant Asian megacity size. And the cultural explanation could also illustrate the varia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between East and West.

Key words: urbanization, city size, megacity, dream pursuing

一、前言

1938年，Louis Wirth 在其著名的文章「都市主義做為一種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開宗明義就指出：世界的都市化²(urbanization)發展，是當代社會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它對人們社會生活的各種面向，帶來了全然深切的改變(Wirth, 1938)。

七十多年過去了，人類文明「都市化」的發展趨勢毫無停歇且不斷加速，越來越多的人口居住在所謂的「都市」中。根據聯合國「2009年全球都市化展望報告」(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9 Revision)的資料，在1950年，全世界只有28.8%(7.3億)的人口居住在都市中，1975年為37.2%(15.1億)。2009年，全球生活在都市的人口比例，正式跨越過50%(34.2億)的門檻。根據同一份報告的預測，2025年，全世界將有56.6%(45.4億)的人口居住在都市裡。而其中在比較高度發展的地區³，都市人口比例更會高達近80%(United Nations, 2010)。

為何大多數的人們偏好居住在都市中？都市的哪些特質可以提升居民的效用？一般而言，「都市」，是各種產品、服務、金融財富集中的地方，也是謀生與提升社會階級的希望所在。居民們選擇居住在都市裡，是其衡量各種條件下的最適決策(Ritsila and Ovaskainen, 2001;林季平，2005；張慈佳與胡海豐，2006；Saunders, 2010)。

都市所具備的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聚集經濟(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等優勢，是促使都市(人口)成長的助力；另一方面，隨著都市規模(city size)變大，各種成本亦逐漸攀升，抑制了都市的成長(Geltner et al., 2007; McDonald and McMillen, 2010)。這些助力與阻力的消長，決定了都市的人口規模動態。在這樣的概念下，當都市成長的助力與阻力相等時，都市的規模就會趨於穩定。然而，這樣簡單的推論，有時對於都市發展現實的解釋是力有未逮的。

首先，各個都市的規模差異性極大。從靜態的觀點來看，都市規模的分佈，經常呈現出一種階層(hierarchy)或金字塔的型態，亦即：很多的小鄉鎮，較少的大鄉鎮，更少的城市，幾個大都會(McDonald and McMillen, 2010)。著名的都市「名次/規模」規則(rank/size rule, $P_i = P_1/i$ ，其中 P_1 是最大都會的人口數； P_i 是規模排序第 i 大都市的人口數)，描述了都市大小排序(rank)與其都市人口總數(size)的關係，也稱為「Zipf 規則」(Zipf's rule)⁴。除了少部分的例外，許多實證研究的結果都支持這樣的規則(Marshall, 2007)⁵。這種現象說明了越大型的都市，對於人口的吸引力也越大。至於都市的發展為何會產生這樣的型態，研究者仍然有許多疑惑(Geltner et al., 2007)。

² 根據 McDonald and McMillen(2010)的定義，「都市化」指的是一個社會從鄉村生活轉變為城鎮生活，居民就業型態也從農業轉變為工業化大量生產與服務的過程。如果一個社會只需要有少比例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就能養活整個社會時，社會就會走向「都市化」的發展趨勢。

³ 在該份報告中，關於全球都市地區人口的數目與比例，另有區分成「高度發展區」(more developed regions)與「低度發展區」(less developed regions)兩種資料。

⁴ 廣義的「Zipf 規則」可以寫成 $P_i = K i^{-a}$ 。其中， K 是常數，約等於 P_1 ； a 是數值接近-1 的常數(Marshall, 2007)。

⁵ 例如 Soo(2007)的實證結果並不支持「Zipf 規則」。他以馬來西亞 1957、1970、1980、1991、與 2000 年的人口資料實證研究，發現除 1957 年的資料符合 Zipf 規則外，其他時期的資料都不符合。

其次，近代全球興起了一些人口超過1000萬的巨型都市(megacity)⁶，這些巨型都市主要發源於東亞，包括中國的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日本的東京-大坂廊道(Tokaido corridor)，與印尼的大雅加達(Greater Jakarta)等，近代也出現於美國與歐洲(Hall, 2009)。

觀察當代亞洲與歐美地區巨型都市發展的時空脈絡，可發現其中存在著一些基本差異。例如，在2011年，全球共有26個人口超過1000萬的巨型都市，其中15個位於亞洲，並涵蓋了前六大，只有7個巨型都市位於北美與歐洲地區；另外，在這些亞洲巨型都市中，包括中國的北京、上海、廣州；南韓的首爾；印度的孟買、德里；巴基斯坦的喀拉蚩；與孟加拉的達卡等，其人口至今仍持續有大幅度的增長。反之，歐美地區的倫敦、紐約等巨型都市，人口數則相對地穩定許多。⁷即便亞洲的日本東京，雖然其動態人口成長率與歐美的紐約、倫敦相當，年成長率都在1%以下，但其靜態的人口規模卻遠大於後者。⁸就人口密度而言，亞洲大都市的人口密度，普遍也大於歐美都市(Tan et al., 2008)。⁹

這些觀察，說明了原先解釋都市規模的經濟理論，在亞洲巨型都市的應用上，可能有補充的空間。換言之，我們似乎忽略了某種促進都市人口成長的因素，而這種因素在亞洲地區的強度會大於歐美地區。本文試圖藉由東西方關於「夢想追尋」的文化差異，來解釋亞洲巨型都市規模不斷擴大的原因，並補充說明東西方都市人口規模與密度的差異。

全文共分為五節，除本節外，第二節從都市規模的推拉理論出發，解釋都市的形成；第三節比較了東西方巨型都市在人口規模、成長率、與人口密度等面向的差異；第四節在都市推拉理論的模型上，再加上「至大都市追尋夢想」的心靈期望，藉以說明東西方都市推拉力量大小的差異，並提出「大量勞工移入/ 都市經濟成長/ 夢想追尋意念增強」，三者的正向循環，據以說明亞洲巨型都市人口規模動態的特色；最後第五節為結論。

二、都市的擴張與收縮

「都市區域」的概念自20世紀中葉由Patrick Geddes (1915)在著作「革命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提出以來，至今已經過巨大的轉變，各類都市分析者也急切地想要瞭解都市區域的空間動態變化(Hall, 2009)。

關於都市的形成與其規模，學說上有兩種典範。一種是大規模開發商在國家土地市場的競爭

⁶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所謂的「巨型都市」，指的是人口超過 1000 萬，或是人口密度至少達到每平方公里 2000 人以上的大都會。在這樣的定義下，2010 年全球被歸類為「巨型都市」的地區共有 26 處，包括：東京(Tokyo)、廣州(Guangzhou)、首爾(Seoul)、上海(Shanghai)、德里(Delhi)、孟買(Mumbai)、墨西哥市(Mexico City)、紐約市(New York City)、聖保羅(São Paulo)、馬尼拉(Manila)、雅加達(Jakarta)、洛杉磯(Los Angeles)、喀拉蚩(Karachi)、大阪(Osaka)、加爾各達(Kolkata)、開羅(Cairo)、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莫斯科(Moscow)、達卡(Dhaka)、北京(Beijing)、德黑蘭(Tehran)、伊斯坦堡(Istanbul)、倫敦(London)、里歐捷立諾(Rio de Janeiro)、拉歌斯(Lagos)、與巴黎(Paris)等。(以上按人口數目由大至小排列，資料來源：Thomas Brinkhoff: The Principal Agglomerations of the World。)(<http://www.citypopulation.de/world/Agglomerations.html>)，(July 1, 2011)。

⁷ 西元 2010 年的資料顯示，亞洲的巨型都市，廣州、德里、孟買、喀拉蚩、達卡等，其人口年成長率都超過 4%，北京 2.7%，上海 2.2%，首爾 1.4%，東京 0.6%，倫敦 0.7%，紐約的成長率則只有 0.3%。(資料來源：Thomas Brinkhoff: The Principal Agglomerations of the World。)(<http://www.citypopulation.de/world/Agglomerations.html>)，(July 1, 2011)。

⁸ 2010 年，東京的人口規模為 3430 萬，紐約為 2200 百萬，倫敦則不到 1300 萬。(資料來源：Thomas Brinkhoff: The Principal Agglomerations of the World。)(<http://www.citypopulation.de/world/Agglomerations.html>)，(July 1, 2011)。

⁹ 這裡「都市人口密度」的計算，係指一個都市的總人口數，除以該都市的土地面積。各都市人口數目資料來源為 Thomas Brinkhoff: The Principal Agglomerations of the World。(<http://www.citypopulation.de/world/Agglomerations.html>)；各都市面積資料來源為聯合國(<http://esa.un.org/unup/index.asp?panel=1>)，(July 1, 2011)。

模型；另一種則是經濟上聚集效果的自我組織模型(Henderson and Becker, 2000)。研究上多從聚集經濟、規模經濟的效果來解釋都市的人口成長(Moomaw, 1981; Henderson, 1986; Certero, 2001; Au and Henderson, 2006)。但對於都市人口規模的成長動態，相對上則較少著墨(Tan et al., 2008)。

從動態的觀點來看，影響都市規模的因素，可以從「都市本身」與「週邊地區」兩方面的影響來討論：

在「都市本身」的因素方面，主要是指都市自身的特點，例如基礎建設、稅制、與環境寧適性等，如何影響都市人口的流入與流出；至於都市「週邊地區」對都市成長的影響，則主要是指都市週邊(或較遠的鄉村區)的環境特性，如何影響人們由鄉村遷徙至都市，或是由都市回流至鄉村的決策。以圖1說明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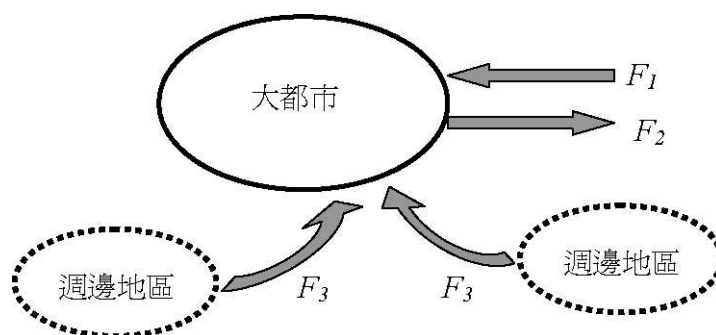


圖 1 影響都市(人口)成長的因素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一)都市本身的條件對於人口成長的影響

1. 都市成長的助力(或稱為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圖1中的 F_1)¹⁰，主要包括：

- (1) 規模經濟：在生產的固定成本(fixed costs)不變的情況下，都市大量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可以降低生產的平均成本。
- (2) 聚集經濟：同類型(同產業)的廠商，當他們聚集(clustering)或靠近時，能夠降低彼此的生產成本。一般聚集經濟可分為「垂直連結」(vertical linkage，指生產的上下游廠商的垂直整合)與「水平連結」(horizontal linkage，指同類型廠商分享彼此知識所產生的綜效)兩類。
- (3) 正區位外部性(positive locational externalities)：廠商可以藉由附近工廠的行為而獲得利益。由於該利益無法由生產的工廠自行獲得，因此其生產行為對其周圍廠商產生了正的外部性。另外，不同於聚集經濟需要一定數量的廠商聚集，「正區位外部性」只發生在鄰近的幾家廠商間(Geltner et al., 2007)。

¹⁰ 相對於週邊地區對於都市成長影響的推力(push factors)，這種都市經濟條件對於都市成長的助力，有時也被稱為都市成長的「拉力」(pull factors)(McDonald and McMillen, 2010)。

2. 都市成長的阻力(也稱為離心力 (centrifugal force)，圖1中的 F_2)，主要包括：

交通擁塞 (congestion)、各種污染、都市犯罪、都會區通勤的高成本 (high intra-urban transportation costs)、高昂的房租與房地產價格 (Geltner et al., 2007)。一般而言，這些不利都市成長的因素，其力道會隨著都市的擴大而逐漸增加 (Brueckner and Zenou, 1999; Brueckner and Kim, 2001; Cervero, 2001; Decker et al., 2007; 劉小蘭等，2010)。

(二) 週邊地區對都市成長的推力 (圖 1 中的 F_3)

如果貧窮的鄉村 (rural poverty) 無法提供人們生活的基本所需，人們礙於生存的壓力，將被迫離開貧窮或天災頻仍的鄉村。由於其本身社經條件的弱勢，這類居民即使遷居至大都市，自然也無法負擔市區高昂的房地產價格 (或租金)，因此多半會生活在都市的邊陲地帶或貧民窟 (Mak et al., 2007; Grant, 2008; Pyne and German, 2010; McDonald and McMillen, 2010; Stephens, 2010)。¹¹

根據以上對影響都市成長因素的說明，總結而言， F_1 、 F_2 、與 F_3 的相對大小，決定了都市成長或收縮的方向與速度。在都市成長初期，促使都市成長的力量 (F_1+F_3)，會大於抑制都市成長的力量 (F_2)，此時，都市的規模將會不斷擴大。一方面，都市規模的擴張，雖然可能會進一步加強都市成長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伴隨都市成長所帶來的各種副作用，也會隨之擴大，進而阻止了都市的成長。這些都市成長助力與阻力的消長，決定了都市人口的規模動態。當助力等於阻力，亦即 $F_1+F_3=F_2$ 時，都市的規模就會穩定下來。

當然，這種穩定的均衡值，會隨著外生條件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例如，更高層的建築，更方便的都市內部交通，創新的資訊技術等，都可以進一步增加都市的均衡人口。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促使都市更緊緻 (compact) 發展的技術，並不會永無止盡。因此，都市的規模，在理論模型上應該會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極限值。另外，在都市規模擴大的動態過程裡，如果有過度調整 (overshooting) 的情形，則都市的規模會在達到一極限值後開始收縮。實務的解釋即是當都市的規模大到產生許多生活上的不寧適時，部分居民將會選擇遷出都市。

此外，在當代都市社會學的觀點裡，「都市區域」的概念，並不是由其地理上或形態上來定義，也不是所謂一種行政單位 (administrative units) 的概念，它毋寧是一種奠基於 Manuel Castells (1989) 所提「空間的流動」 (space of flows) 的基礎上，包括人群、資訊與物品的流動 (Hall, 2009)。

三、關於「巨型都市」

衍生於「都市區域」 (city region) 的概念，「巨型都市區域」 (mega-city region) 是一種新型態的空間概念，主要包括一系列 20 至 50 個城市與鄉鎮，它們聚集在一個或多個較大的中心城市上。這些城鄉們雖然在地理分離，但在功能上卻是網絡連結的。

巨型都市的形成，從東亞的上海、廣州、東京、首爾、北美的洛杉磯、紐約及至歐洲倫敦、巴黎等，是一種城市空間上的演化 (Hall, 2009)。從近代關於空間再尺度化 (space rescaling) 的研究

¹¹ 並非所有從鄉村遷入都市的人，都是生活在社會的底層。McGee (2007: 274) 認為：遷移至吉隆坡 (Kuala Lumpur) 的馬來人 (Malays)，其生活的區域有許多房舍是低階中產階級者 (lower middle class) 所擁有的，因此並不能認定這些人是生活在貧窮裡的。

觀點來說，意指空間尺度在經濟網絡全球化的今天，不斷地被重新再定義與重構(Brenner 1998, 2001; Mansfield, 2005; 王振寰, 2007)。全球經濟資本的移動，伴隨著就業機會的轉移(Pollina, 2003)；工業化「大量製造」與「分工」的生產型態，促進了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的集中，也進一步帶動了大量人口的遷徙，特別是居民們從鄉村至大都市的遷徙。從這類觀點來看，巨型都市的形成與演化，是國家政治、經濟政策與社會文化角力的過程。

基於這種概念，觀察全球26個人口超過1000萬的巨型都市，可以發現東西方的巨型都市的形成與結構，存在著一些基本歧異。首先是國家角色的定位。在亞洲，特別是中國，國家都市政策對重點城市的進一步都市化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例如，Tan et al. (2008)認為：在影響都市人口密度的社會因素中，政府政策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項¹²。洪啓東(2001：49)也認為：大陸珠江三角洲的發展除有其時代背景之外，也與中國特殊的經濟政策有關。許多討論政府介入都市事務的文獻也同意，都市的成長管理政策(growth-management policy)，可以避免都市的蛙躍性(urban sprawl)發展，保存都市裡的開放空間，與有效控制都會區分散(de-concentration)發展的趨勢(Chan et al., 2002; Alig et al., 2004; Frenkel, 2004; Chen and Jia, 2005; 胡志平, 2008；劉小蘭等, 2010)。這種認為都市應朝向緊緻發展的主流都市計畫思想，也對於亞洲巨型都市的龐大規模起了一些推波助瀾的作用。

相對於亞洲國家政府經常試圖以政策影響巨型都市的樣貌，歐美地區則是另一種對比。Hall (2009)認為：在其主持的大型研究計畫“POLYNET-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European Polycentric Mega-City Regions”所探究的8個歐洲巨型都市區域裡，除東南英格蘭(South East England)區外，其它巨型都市區域皆是自發演化(spontaneous evolution)的結果。¹³

倫敦發展署(London Development Agency)設計、發展、與環境主任Bishop也曾言：倫敦的市中心是談判和折衷的結果，而不是宏偉規劃所造成的。我們的城市(倫敦)之所以是現在這個樣子，是很多政策上始料未及的結果所形成的，與規劃無關(O'Rourke, 2009)。

因之，在經濟發展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亞洲興起了許多擁有大量人口的巨型都市。具體而言，現今全球共有26個人口突破千萬的巨型都市，其中位於亞洲地區的就只有15個。這些亞洲國家的都市政策，進一步促進了巨型都市中經濟資本的累積，也進一步集中化社會資本。然而，另一方面，卻也加深了城鄉的差距，這些差距不僅表現在城鄉的基礎建設上，也反映在城鄉居民的所得與生活型態差異上。如果說這些「差異」是促使人們遷徙至都市的「誘因」，而大量遷徙至都市的便宜勞工，也直接促進了都市的經濟發展。

表1呈現了全球26個人口超過1000萬的巨型都市之人口數、分佈地區、人口動態、與國民所得(GDP)等資料。從表1的資料，我們有如下的觀察：1. 在全球26個巨型都市中，有15個位於亞洲，並包含了前六大；2. 相對於歐美的國家，在亞洲的巨型都市中，除東京、首爾的人均GDP高達3萬美元外，其餘都屬於偏低的水準。在這些國民所得水準較低的國家，其巨型都市的動態

¹² Tan et al.(2008)認為：中國的「可耕地的動態平衡」政策，導致了更緊緻的都市土地利用，進一步地提升了中國大都市的人口密度。

¹³ Hall 主持的 POLYNET 計畫所探究的 8 個歐洲巨型都市區域包括：東南英格蘭(South East England)、比利時中央城市(Belgian Central Cities)、荷蘭鹿特丹(The Randstad in the Netherlands)、萊茵魯爾(RhineRuhr)、德國萊茵主區(The Rhine-Main region of Germany)、北瑞士歐洲大都會區(The European Metropolitan Region (EMR) Northern Switzerland)、大都柏林(Greater Dublin)、與法國巴黎區(Paris Region)等(Hall, 2009)。

人口成長率通常較高，例如廣州(中國)、孟買(印度)、與達卡(孟加拉)等，其人口年成長率皆在4%以上；3. 即便在高國民所得的日本東京，雖然其動態人口成長率不高(2010 年成長率0.6%)，但相較於紐約、倫敦，其靜態人口數卻遠勝之；4. 韓國首爾的靜態人口數與紐約相當，但其動態人口成長率仍維持一個相對較高的水準(2010 年成長率1.4%)。

圖2則繪製了全球知名都市(包括26個巨型都市)的人口數與都市面積分布圖，從圖2中可約略看出亞洲都市通常有較高的人口數，人口密度(人口數/都市面積)也較高。

這些東西方巨型都市人口結構的差異，隱含了東西方都市規模推拉力量「內涵」與「強度」的不同。

另外，這些決定都市人口規模的推拉力量，除了受到國家都市政策的影響外，居民內心關於遷徙選擇的考量，更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換言之，雖然國家政策與環境形塑了各個都市的外在條件，然而，這些外在條件對於居民遷徙決策的影響，更受到居民自身條件與文化背景薰陶下的人格特質所左右。

表 1 全球巨型都市之人口數、分佈地區、人口動態、與人均國民所得(GDP)一覽表

人口排名	巨型都市 ^a	國家	洲別	人口	(年成長率)	GDP ^b (世界排名) 單位：美元/人*年	
1	東京	日本	亞洲	34,300,000	(0.60%)	34,740	(24)
2	廣州	中國	亞洲	25,200,000	(4.00%)	8,382	(92)
3	首爾	南韓	亞洲	25,100,000	(1.40%)	31,714	(25)
4	上海	中國	亞洲	24,800,000	(2.20%)	8,382	(92)
5	德里	印度	亞洲	23,300,000	(4.60%)	3,694	(129)
6	孟買	印度	亞洲	23,000,000	(2.90%)	3,694	(129)
7	墨西哥市	墨西哥	北美洲	22,900,000	(2.00%)	14,610	(63)
8	紐約市	美國	北美洲	22,000,000	(0.30%)	48,387	(6)
9	聖保羅	巴西	南美洲	20,900,000	(1.40%)	11,769	(75)
10	馬尼拉	菲律賓	亞洲	20,300,000	(2.50%)	4,073	(126)
11	雅加達	印尼	亞洲	18,900,000	(2.00%)	4,666	(122)
12	洛杉磯	美國	北美洲	18,100,000	(1.10%)	48,387	(6)
13	喀拉蚩	巴基斯坦	亞洲	17,000,000	(4.90%)	2,787	(137)
14	大阪	日本	亞洲	16,700,000	(0.15%)	34,740	(24)
15	加爾各答	印度	亞洲	16,600,000	(2.00%)	3,694	(129)
16	開羅	埃及	非洲	15,300,000	(2.60%)	6,540	(104)
17	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	南美洲	14,800,000	(1.00%)	17,516	(51)
18	莫斯科	俄羅斯	歐洲	14,800,000	(0.20%)	16,736	(53)
19	達卡	孟加拉	亞洲	14,000,000	(4.10%)	1,693	(155)
20	北京	中國	亞洲	13,900,000	(2.70%)	8,382	(92)

表 1 全球巨型都市之人口數、分佈地區、人口動態、與人均國民所得(GDP)一覽表

人口排名	巨型都市 ^a	國家	洲別	人口	(年成長率)	GDP ^b (世界排名) 單位：美元/人*年	
21	德黑蘭	伊朗	亞洲	13,100,000	(2.60%)	13,053	(69)
22	伊斯坦堡	土耳其	歐洲或亞洲	13,000,000	(2.80%)	14,517	(64)
23	倫敦	英國	歐洲	12,500,000	(0.70%)	36,090	(22)
24	里約熱內盧	巴西	南美洲	12,500,000	(1.00%)	11,769	(75)
25	拉哥斯	奈及利亞	非洲	12,100,000	(3.20%)	771	(177)
26	巴黎	法國	歐洲	10,197,678	(1.00%)	35,156	(23)

註解：a. 各都市的中英譯對照，請參見註²。

b. 為齊一比較的基礎，各國GDP 的數值皆經過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的調整。

資料來源：1. Thomas Brinkhoff: The Principal Agglomerations of the World. (1 July 2011)

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in 2011. (18 April 201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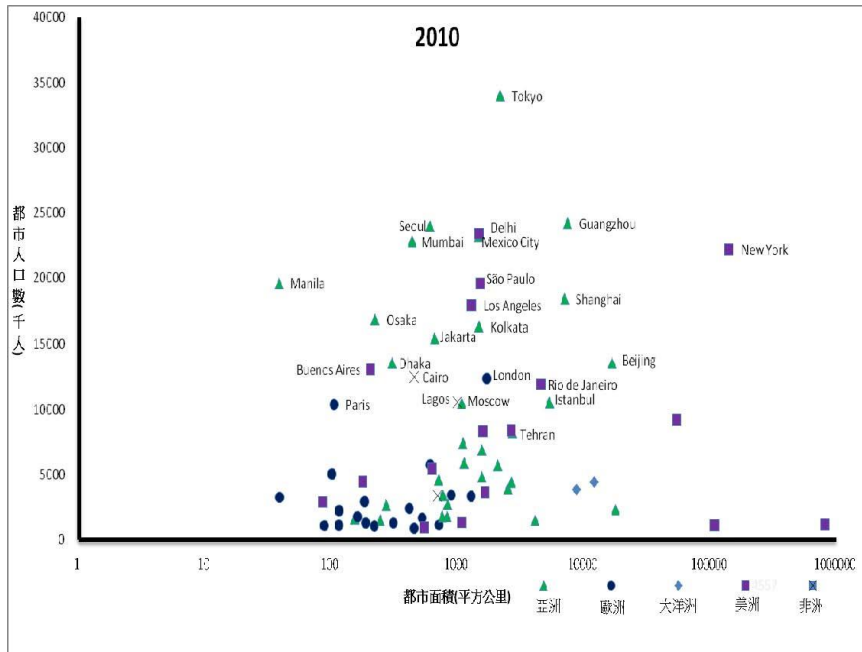


圖 2 全球主要都市的人口數與面積分佈圖(2010 年)

資料來源:人口數資料來源為 The Principal Agglomerations of the World，各都市面積資料來源為聯合國。¹⁴

四、夢想追尋：一種關於亞洲巨型都市規模的文化解釋

在第二節圖1的分析架構下，無論是政府的政策規劃，或是居民自主式的遷徙選擇，皆可透過圖1中的 F_1 、 F_2 、與 F_3 的相對大小變化，來解釋都市人口成長的動態。但須注意的是，即便是同一種政策，同一種都市環境，對於不同屬性個人之遷徙決策的影響，也不會相同(林季平，2008；劉千嘉與林季平，2010)。

基於下述東西方巨型都市的比較：1. 全球26個人口超過1000萬的巨型都市，15個位於亞洲，並涵蓋了前六大，只有7個巨型都市位於北美與歐洲地區；2. 亞洲地區巨型都市的人口密度高於北美或歐洲地區；3. 亞洲地區巨型都市的人口規模，仍隨著經濟發展而持續擴大；4. 相對於歐美地區的已開發國家，亞洲開發中國家的國民所得較低。我們可以推論：在亞洲地區，某些促進都市人口成長的助力，可能大於歐美地區，而這助力的內涵，可能與居民的所得水準與文化背景有關。因此，本文認為：亞洲開發中國家居民透過遷徙，至大都會「追尋夢想」的行為，可能是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之一。換言之，在一般解釋都市規模的聚集經濟理論外，人們的「都市夢」，對於亞洲巨型都市的龐大規模，可以補充一種文化面向上的解釋。

這裡所謂的「夢想追尋」，是狹義地指：功成名就、賺大錢、或衍生的下一代社經地位的提升等。這主要是要強調人們在遷徙時，除了追尋所謂的「工作機會」外，內心有一種更深層的渴望。

這樣的想法主要來自於一般關於遷徙理論文獻的回顧與反省。在許多探討遷徙的文獻中，其理論架構多設定為人們往可以提高其「主觀效用」值的地區移動，而這個「效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的變項(或因變數)，則依不同的文獻會有不同的設定。多數是以工作機會、薪資水準、環境寧適性、租稅等作為效用函數的變項(Ritsila and Ovaskainen, 2001; Davies et al., 2001; 林季平, 2005; 張慈佳與胡海豐, 2006)。最後均衡(即人們的淨遷徙率為零)的條件為：居民在各地區的效用水準值相同。這樣的理論雖然在邏輯上相當清晰，但其中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地方在於：這些影響效用函數的變項，人們通常只會有一個大概的印象，說不上有精確的瞭解。

換言之，對於一般的民眾而言，其對於各地區工資水準、工作機會、與生活成本等資訊，通常並不太可能具有精確性的瞭解，他們對於都市的瞭解，多停留在相當粗略的印象或想像。他們遷徙至都市的決策，也可能是基於這些粗淺的資訊，甚至只是一種「信念」(belief)。他們遷徙至都市的決策，雖然可以由理性的經濟選擇來解釋，卻也不免帶有至大都市「追尋夢想」與「追求成功」感性考量。這是一種追求成功，賺大錢，衣錦還鄉的憧憬。雖然明知成功的機會渺茫，卻仍然義無反顧。這樣的想法與行為，就如同展望理論 (prospect theory)所揭示的。¹⁵

¹⁴ 其他未標出地名的都市分別位於美洲：Auchland、Ottawa、Toronto、Washington D.C、Chicago Lisbon、Guatemala、Managua、Bogota、Lima、Johannesburg；亞洲：Taipei、Kaohsiung、Hong Kong、Kyoto、Singapore、Bangkok、Ho Chi Minh City、Busan、Kuala Lumpur、Baghdad、Kuwait、Riyadh、Ankara、Dubai、Kiev、Alexandria；歐洲：Manchester、Dublin、Amsterdam、Copenhagen、Stockholm、Brussels、Hamburg、Berlin、Milan、Rome、Madrid Barcelona、Athens、Helsinki、Oslo、Vienna、Prague、Munich、Budapest、Warsaw、Zurich；非洲：Nairobi；與大洋洲：Sydney、Melbourne。

¹⁵ 展望理論，亦稱為「前景理論」，是由 Daniel Kahneman 與 Amos Tversky 於 1979 年所提出。

不同於以往極大化「預期效用值」的最適決策概念，在展望理論中，還加入了關於各種結果(outcomes)的「主觀決策權數」(decision weights)。將各種結果的「預期效用值」再乘以這種結果所對應的「主觀決策權數」，就構成了所謂的「價值函數」(value function)。展望理論以「價值函數」取代了傳統的「效用函數」。在這種理論架構下，行為人在決策時的準則是追求主觀「價值函數」的極大化。至於各種結果客觀發生的機率，就顯得較為次要。更重要地，展望理論也提出：一般而言，行為人對於出現機率極小的結果，常會給予較大的決策權數，反之，對於機率較大，較容易出現的結果，所給予的決策權數則較小(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這種理理解釋了在預期效用理論決策架構下的Allais矛盾(Allais paradox)，說明了人們明知中大獎的機率極小，卻仍然可能樂此不疲地購買期望報酬為負值的彩券(洪來發, 2004)。同樣地，展望理論的概念也可以用來說明本研究提議的「追尋夢想」行為。如果人們認為「追求成功」是人生的重要選項，而又主觀地認為「大都市」比較有成功機會的話，則他們遷徙至大都市的行為，就反映了「夢想追尋」這樣的信念。

應用這樣的概念，可以說明「夢想追尋」在都市推拉理論中可以扮演的角色。詳言之，在傳統都市推拉理論的模型裡，「工作機會」、「薪資水準」是一般認定的「都市拉力」，可吸引民眾遷往都市發展。但這樣的都市拉力，恐怕不足以解釋東西方巨型都市人口規模與密度的差異，也不足以說明何以在一些亞洲開發中國家的指標性巨型都市中，即便其龐大人口規模帶來急遽上升的環境不寧適，包括令人無法負擔的高聳房價、環境污染、與交通擁塞等，也無法阻止人們的持續遷入，況且，其中更有許多人是居住在環境惡劣的貧民窟之中。

因此，本文提出了「至都市追尋夢想」的心靈期望，藉由這樣的處理，可以在傳統的都市推拉理論上，增加都市對民眾的拉力強度，並藉以說明這些亞洲巨型都市的人口結構特色。

相對於西方社會強調的「個人主義」與多元成就的追求，在亞洲傳統文化中，則較注重群體的和諧，對於所謂的「成功」，除定義較為狹隘，多偏向金錢的報酬外，心理的渴求強度一般說來也高於西方的社會(Sheh, 2001; 王冠璽, 2011)。亞洲父母們在小孩的教育上，也多強調小孩的成功，不只是他個人的成就，更是一種「光耀門楣」，是一種「孝順」的表徵(Salili, 1996; Sheh, 2001; Ji, 2008; Hofer et al., 2010; 王冠璽, 2011)。這樣的文化背景，可能使得這些住在都市的居民(特別是經濟上較弱勢的居民)，在「追尋夢想」的理想下，更能夠忍受擁擠與不寧適的都市環境(Sheh, 2001)。因之，在拉長生命週期(包括本身與其下一代)的決策中，留在都市裡，常是居民們在權衡各種條件下的最佳選擇。

將這種文化上的原因放入「遷移」的理論中，我們可設定居民的價值函數為 $V=V(D, X)$ ，其中 D 為「夢想」， X 為其他影響居民心理滿足程度的因素。在 X 不變的情況下， D 值增加，將能提高居民的心理滿足程度。另外，從研究遷徙的文獻中，一般認為居民所得越低，或者城鄉貧富差距越大的話，其遷移至都會區的意願也越強(Stephens, 2010)。因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居民個人的夢想強度 D ，是其所在國家「國民所得水準」的減函數(decreasing function)(Hofer et al., 2010)，是該國「城鄉貧富差距」的增函數(increasing function)。亦即，如果該國的國民所得越低，城鄉貧富差距越大，則該居民遷徙至都市「追尋夢想」的意願越強。

將這些設定套用在圖1。對於「夢想追尋」強度較大的人，環境不寧適對於都市成長的阻力 F_2 ，對其作用力將較小；另外，週邊地區對於都市成長的推力 F_3 ，則對這些人的影響較大。因此，在這些國民所得較低，且城鄉貧富差距較大的地區，促進都市人口成長的淨作用力($F_1+F_3-F_2$)將會較大。

這種將「夢想追尋」加入都市居民價值函數的設定，可以補充解釋亞洲地區巨型都市的人口規模仍不斷擴大的現象，也能部分說明東西方都市的人口密度差異。

不同於Kasanko et al. (2005)以「地理的疆界」、「都市化過程的歷史起源」、與「政策」等因素，解構了15個歐洲都會區人口密度差異的原因。Tan et al. (2008)更認為：「社會因素」，例如歷史傳統與文化背景等，也是影響都市人口密度的重要因子，但卻不容易找到可以衡量的指標。¹⁶本研究認為：這些東方的「歷史傳統、文化背景」，與都市規模與人口密度的關係，可以由「到大都市追尋夢想」的意象或信念來傳達。

關於「夢想追尋」對於居民(特別是鄉村居民)遷徙至大都會之決策所扮演的角色，在許多正式與非正式的文獻，或電視電影等作品中，常可見其蹤跡，特別是在經濟快速發展中的亞洲國家。

例如1996年香港導演陳可辛所拍攝，紅遍中、港、台三地的電影「甜蜜蜜」(comrades, almost a love story)、賀照緹(Ho Chao-ti)的記錄片「我愛高跟鞋」(my fancy high heels)，與Pyne and German(2010)發表在GlobalPost網站，一系列關於亞洲孟加拉首都達卡的報導等，都深刻地刻畫出都市中的外來居民，那種離鄉背井，「追逐夢想」的心情。Saunders (2010)的專書也描述了許多類似的渴望。

文獻上，張慈佳與胡海豐(2006)曾以台灣地區的遷徙資料，說明了「夢想追尋」與遷移行為的連結，估量出夢想追尋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劉千嘉與林季平(2010)也指出：台灣原住民經常以都會區作為其終身遷徙的標的。這些資料都反映出，在某種程度上，雖然都市對於遷徙者來說，可能伴隨著較高的生活成本，但為了追求心中的夢想，遷徙者仍然可能持續地遷入大都會中。¹⁷

尤其對於那些經濟上較弱勢的居民，他們甘願承受勞苦，窩居在市中心邊緣的貧民窟，也不願回到鄉村，除了鄉村工作機會的匱乏外，也因大都市不只可(稍稍)滿足他們衣食上的基本需求，更讓他們心裡的夢想有一絲滋長的空間(Wu, 2008; Pyne and German, 2010)。換言之，雖然現代的都會對於低教育程度者的遷入具有經濟上的排擠效果(林季平, 2005)，較弱勢的邊際勞工¹⁸，如果因追尋夢想而強迫自己遷入大都會，通常並不容易獲得較高的工資報酬。然而，大都會內許多低階的工作機會，至少可讓這些人獲得基本生存的可能性(Wu, 2008; 劉千嘉與林季平, 2010; Pyne and German, 2010)。在生活的下限已知，希望卻無窮的情況下，他們仍可能選擇居住在大都會中。

有些人認為，大都會中的貧民窟是嚴重的社會問題。混亂、疾病、骯髒的景象，讓居住在文

¹⁶ Tan et al. (2008)指出：為探究都市人口密度的差異，其解釋變數的選擇乃基於：1. 資料是可得的；2. 這些變數是容易測量的；3. 這些獨立的解釋變數之間沒有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等條件。在上述「變數選擇」的第二項條件中，Tan et al. 提到有些社會因素，例如歷史的傳統，文化的背景等，雖然可以解釋都市人口密度的差異，卻因為這些因素並不容易測量，而無法納入他們的實證研究之中。

¹⁷ 在本研究所引用關於「都市夢」的文獻或資料中，有些研究的對象是「巨型城市」，有些研究對象則是所謂的「大都市」。由於這些文獻資料所探討的「都市」，並沒有明確的都市人口規模限制，這些研究的邏輯也不會因為是否到達「巨型城市」1000萬人口的門檻而改變，因此這些文獻資料在本研究中是混用的。

¹⁸ 根據林季平(2005)的研究，雖然邊際勞工沒有很明確的界定方式，但在概念上若一個勞動者因自身或因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及文化等環境之主客觀因素，使其於勞動市場的競爭力不足時，即可界定為邊際勞工。例如年齡偏高或人力資本偏低的勞動人口就是典型的邊際勞工。

明都市的人難以接受。但反過來想，都市的經濟發展也與貧民窟的龐大人數有關 (Brand, 2009)。對大都會而言，其週邊貧民窟的意義，不只是人口的單純增長，他們所提供的大量且便宜的人力，更直接促進了都市地區的經濟發展，進一步加強了都市聚集經濟的效果(Au and Henderson, 2006)。如同Brand(2009)所指出的：傳統上大家以為貧民窟是都市的問題 (problem)，新想法則認為貧民窟是都市的解藥 (solution)。

延續這種觀點，因大量人口移入而繁榮的都會，又進一步強化了鄉村人口移入都市「追尋夢想」的動機。這種人口移入，經濟成長，夢想增強；人口進一步移入，經濟進一步成長，夢想進一步增強的正向循環，可以用來解釋亞洲巨型都市地區，例如廣州、上海、北京、首爾、德里、孟買、達卡、與德黑蘭等，人口仍持續高度增長的現象。

另外，日本東京是個有趣的例子。東京地區雖然其動態的人口成長率不高(2010年東京的人口成長率為0.6%)，與歐美的紐約、倫敦相當，但其卻擁有全世界最大的靜態人口規模，超出後者甚多。

本文先前曾提及居民個人的夢想強度是其所在國家國民所得水準的減函數；如果再加上都市的動態人口成長率正比於夢想強度的命題，兩者結合起來即為：都市人口成長率是國民所得水準的減函數。亦即，當國民所得水準較高時，該都市的人口動態成長率就較低，但這並不意含靜態的均衡人口總數就較低。

就東京而言，相對於亞洲其他的巨型都市，其國民所得水準較高，甚至與歐美地區的先進都市相比，也不惶多讓 (請見表一)。在這樣的高所得背景下，東京這個巨型都市的人口年成長率只有0.6%(2010年)，與紐約、倫敦相當，遠低於亞洲其他巨型都市，例如廣州、孟買、與達卡等高達4%以上的人口年成長率。至於東京地區現有龐大的都市規模，則可以從「夢想追尋」的文化因素來解釋。如果我們把「都市夢」放入東京居民的價值函數裡，由於夢想追尋的心理效果可以提升居民的滿足程度，此時東京「都市總剩餘」最大值時所對應的人口數，在理論上將會大於Zheng (2007)所推估的1800萬¹⁹，這樣的概念可以解釋東京地區的人口規模與動態。亦即，同樣在都市規模推拉理論的架構下，對東京而言，如果其居民「夢想追尋」強度大於紐約、倫敦的居民 (此時「夢想追尋」的強度已不足以使得都市人口大幅淨增加)²⁰，仍可以表示在都市成長推拉力量平衡時所需的靜態人口數，東京是大於紐約與倫敦的。

最後，由於這種「都市夢」對居民遷徙的影響，並不容易找到可以量化的指標(Tan et al., 2008)，以致只有相對少數的文獻，例如張慈佳與胡海豐(2006)，對此曾做過量化的估計，估算出「都市夢」與工資、地租的抵換關係。然而，就像是台灣戒嚴時期(1949至1987年)所流行的「美國夢」(Berry, 2009)，雖然難以測量，但的確對許多台灣民眾移民美國的決策，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²¹

¹⁹ 不同於Moomaw(1981)、Henderson(1986)、Cervero(2001)與 Au and Henderson(2006)等，以都市的聚集經濟效果來探討都市的規模，Zheng(2007)則用整個社會的剩餘函數(surplus function)來推估都市的規模，其認為東京的最適人口規模應為1800萬，但西元2000年時，東京的人口已經超過3200萬，顯然已經超過Zheng的推估。時至今日，東京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逐年增加，至2010年時，其人口已經超過3600萬(United Nations, 2010)，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巨型都市。

²⁰ 此時由於東京的人口總數已相當龐大，所帶來的環境不寧適性也大，因此，抵銷了「夢想追尋」的作用，使得東京的動態人口成長率也很低。

²¹ 在台灣戒嚴時期，由於台灣的經濟起飛與美國通俗文化流入的背景，使得留學或移民美國成為當時大家最嚮往的事(Berry, 2009)。

五、結論

世界的「都市化」是現代文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實，也對人類生活面貌帶來了巨大的改變(Wirth, 1938)。此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也隱含著「都市化」已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都市化專業分工、大量生產的生活型態，也提升了大多數人的福祉。

一般而言，關於都市規模的影響因素，可以由「都市本身」與其「週邊地區」兩方面的特性來討論。「都市本身」的規模經濟、聚集經濟、與正區位外部性，是都市成長的助力；另一方面，都市本身因成長所伴隨的各種副作用，例如交通擁塞、環境污染、犯罪、高昂的生活成本等，則抑制了都市的成長(Geltner et al., 2007)。都市「週邊地區」對都市成長的影響，則主要是因為貧窮的鄉村區，無法提供人們的基本生活所需，而迫使人們從鄉村遷徙至都市。理論上，這些都市成長的助力與阻力的消長，決定了都市人口規模的動態。

然而，觀察東西方世界巨型都市的發展，可發現：1. 在26個巨型都市中，就有15個位於亞洲，並包含了前六大；2. 相對於歐美的國家，在亞洲的巨型都市中，除東京、首爾的人均GDP達到歐美先進國家的標準外，其餘都屬於偏低的水準。在這些國民所得水準較低的國家，其巨型都市的動態人口成長率通常較高；3. 即便在高國民所得的日本東京，雖然其動態人口成長率不高，但相較於紐約、倫敦，其靜態人口數卻遠勝之；4. 韓國首爾的靜態人口數與紐約相當，但其動態人口成長率仍維持一個相對較高的水準。

這些觀察，說明了原用以解釋都市規模的經濟理論，在亞洲巨型都市的應用上，可能有補充的空間。

本文奠基於傳統都市規模的推拉理論模型，再加上「至大都市追尋夢想」的心靈期望，經由亞洲居民「夢想追尋」強度較大的設定，可以在理論上說明東西方都市推拉力量大小的差異，並藉以解釋何以亞洲巨型都市在人口靜態規模、動態成長率、與都市人口密度等面向，都偏大於歐美的巨型都市。另外，本文也提出了「大量勞工移入/ 都市經濟成長/ 夢想追尋意念增強」，三者的正向循環，據以說明亞洲巨型都市人口規模，仍隨著經濟發展而不斷大幅增加的特色。

引伸而言，如果接受這類「都市夢」的命題，對於當代的都市計劃而言，將會影響到計畫「目標」的順序。詳言之，「城鄉平衡發展」一直是許多都市計畫者追求的目標，許多城鄉建設也在這樣的目標下規劃，進而希望在鄉村地區投入較多的建設資源。但如果人們具有「至大都市追尋夢想」的信念，心中連結了「大都市」與「成功夢想」的意象，則人們居住在「大都市」的意願會比原先的估計要高。若此，則城鄉平衡發展的政策將會事倍功半。因此，如何讓人們瞭解：鄉村也可以是追尋夢想的所在，成功不必去台北(劉佩修，2011)。可能是另一個重要的課題。如果人們有「都市與鄉村，皆可是成功之所在」這樣的觀念，「城鄉平衡發展」的可能性才會較高。反之，如果人們並沒有這樣的信念，此時對政府而言，完善大都會的基礎建設，改善都市中貧民窟等落後地區的生活條件，其施政次序可能更優先於城鄉平衡發展的追求。

參考文獻

- 王冠璽，2011，中國人的蘋果拜物教，「天下雜誌」，486：42。
- 王振寰，2007，空間再尺度化的角力：全球化下的臺灣資訊產業與國家機器，「地理學報」，49：39-57。
- 林季平，2005，台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問題回顧：1980-2000，「臺灣社會學刊」，34：147-209。
- 洪來發，2004，「行為財務學：財務管理之心理取向」，台北：華立。
- 洪啓東，2001，初探珠江三角洲地區城鎮的發展現象：長安鎮、順德市，「中國大陸研究」，44(10)：37-70。
- 胡志平，2008，都市發展評估模式實證分析，「建築與規劃學報」，9(1)：37-55。
- 張慈佳、胡海豐，2006，夢想的代價：區域間人口遷移決策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8(3)：417-441。
- 劉千嘉、林季平，2010，影響台灣原住民遷徙的區位及生命歷程要素，「都市與計劃」，37(3)：305-342。
- 劉小蘭、許佩璇、蔡育新，2010，台灣都市蔓延之影響因素分析，「地理學報」，58：49-63。
- 劉佩修，2011，出人頭地不必在台北，「商業週刊」，1235：42。
- Alig, R. J., Kline, D., and Lichtenstein, M., 2004, "Urbanization on the US Landscape: Looking Ahead in the 21st Century",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69: 219-234.
- Au, C., and Henderson, J. V., 2006, "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3: 549-576.
- Berry, M., 2009, "Immigration, Nationalism, and Suicide: Pai Hsien-yung and Pai Ching-jui's Chinese Obsessions and American Dreams", *Bulleti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14: 47-75.
- Brand, S., 2009, *Whole Earth Discipline: An Ecopragmatist Manifesto*,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 Brenner, N., 1998, "Global Cities, Global States: Global City Formation and State Territorial Restructuring in Contemporary Euro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5(1): 1-37.
- Brenner, N., 2001, "The Limits to Scal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Scalar Structur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5(4): 591-614.
- Bruেকner, J. K., and Kim, H., 2001, "Land Markets in the Harris-Todaro Model: A New Factor Equilibrating Rural-urban Migratio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41: 507-520.
- Bruекner, J. K., and Zenou, Y., 1999, "Harris-Todaro Models with a Land Market",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9: 317-339.
- Castells, M.,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Cervero, R., 2001, "Efficient Urbanisation: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the Shape of the Metropolis", *Urban Studies*, 38: 1651-1671.
- Chan, E. H. W., Tang, B. S., and Wong, W. S., 2002, "Density Control and the Quality of Living Apace: A Case Study of Private Housing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abitat International*, 26: 159-175.
- Chen, H., and Jia, B., 2005, "Centralization or Decentralization: The Trend of Chinese City in the Rapid urbanization", *City Planning Review*, 30(5): 61-69.

- Davies, P. S., Greenwood, M. J., and Li, H., 2001, "A Conditional Logit Approach to U.S. State-to-state Migratio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41: 337-360.
- Decker, E. H., Kerkhoff, A. J., and Moses, M. E., 2007, "Global Patterns of City Size Distributions and Their Fundamental Drivers", *PLOS ONE*, 2(9): e934.
- Frenkel, A., 2004, "The Potential Effect of National Growth-management Policy on Urban Sprawl and the Depletion of Open Spaces and Farmland", *Land Use Policy*, 21: 357-369.
- Geddes, P., 1915, *Cities in Evolution*,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 Geltner, D. M., Miller, N. G., Clayton, J., and Eichholtz, P., 2007, *Commercial Real Estate Analysis and Investment (2nd ed)*, Mason: Thomson South-Western.
- Grant, U., 2008, "Opportunity and Exploitation in Urban Labour Markets: Better Economic Opportunity does not Always Mean Better Work", *ODI Briefing Papers*,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 Hall P., 2009, "Looking Backward, Looking Forward: The City Region of the Mid-21st Century", *Regional Studies*, 43(6): 803-817.
- Henderson, J. V., 1986, "Efficiency of Resource Usage and City Size",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1): 47-70.
- Henderson, V., and Becker, R., 2000, "Political Economy of City Sizes and Forma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8: 453-484.
- Hofer, J., Busch, H., Bond, M. H., Kärtner, J., Kiessling, F., and Law, R., 2010, "Is Self-determined Functioning a Universal Prerequisite for Motive-goal Congruence? Examining the Domain of Achievement in three Cult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8(2): 747-780.
- Ji, W., 2008, "Study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al Values: Reflected in the Movie The Treatment", *US-China Foreign Languages*, 6(5): 8-11.
- Kahneman, D., and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2): 263-292.
- Kasanko, M., Barredo, J. I., Lavallo, C., McCormick, N., Demicheli, L., Sagris, V., and Brezger, A., 2005, "Are European Cities Becoming Dispers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15 European Urban Area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77(1-2): 111-130.
- Mak, S. W. K., Choy, L. H. T., and Ho, W. K. O., 2007, "Privatization, Housing Conditions and Affordabili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31: 177-192.
- Mansfield, B., 2005, "Beyond Rescaling: Reintegrating the "National" as a Dimension of Scalar Relation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4): 458-473.
- Marshall, J. D., 2007, "Urban Land Area and Population Growth: A New Scaling Relationship for Metropolitan Expansion", *Urban Studies*, 44(10): 1889-1904.
- McDonald, J. F., and McMillen, D. P., 2010, *Urban Economics and Real Estate: Theory and Practice (2nd ed)*,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 McGee, T. G., 2007, "Many Knowledges of Southeast Asia: Rethinking Southeast in real time", *Asia Pacific Viewpoint*, 48(2): 270-280.
- Moomaw, R. L., 1981, "Productivity and City Size: A Critique of the Evid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6: 675-688.
- O'Rourke, J., 2009, *The Complete UrbanBuzz: Building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Barlett Faculty of Built Environment.
- Pollina, R. L., 2003, "Can We Maintain the American Dream?"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2(3): 54-58.
- Pyne, S., and German, E., (2010). The Dreams of Dhaka's Garment Girls, GlobalPost, <http://www.globalpost.com/dispatch/asia/100831/bangladesh-megacities-part-two-garment-girl#>, (March 1, 2011).
- Ritsila, J., and Ovaskainen, M., 2001, "Migration and Regional Centralization of Human Capital", *Applied Economics*, 33: 317-325.
- Salili, F., 1996,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British and Chinese Student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6(3): 271-279.
- Saunders, D., 2010, *Arrival City: The Final Migration and Our Next World*, Canada: Vintage Canada.
- Sheh, S. W., 2001,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and their Implication to Chinese Management", *Singapore Management Review*, 23(2): 75-83.
- Soo, K. T., 2007, "Zipf's Law and Urban Growth in Malaysia", *Urban Studies*, 44: 1-14.
- Stephens, M., 2010, "Locating Chinese Urban Housing Policy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Urban Studies*, 47: 2965-2988.
- Tan, M., Li, X., Lu, C., Luo, W., Kong, X., and Ma, S., 2008, "Urban Population Densit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32: 471-484.
-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0,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9 Revision*, New York.
- Wirth, L.,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1): 1-24.
- Wu, J., 2008, "The Peri-urbanisation of Shanghai: Planning, Growth Patter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ia Pacific Viewpoint*, 49(2): 244-253.
- Zheng, X., 2007, "Measurement of Optimal City Sizes in Japan: A Surplus Function Approach", *Urban Studies*, 44: 939-951.

胡海豐：夢想追尋：一種關於亞洲巨型都市規模的文化解釋